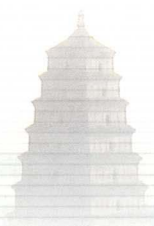




守拙集

刁铁英

著



守拙集

刁铁英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拙集/刁铁英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710-753-8

I. 守… II. 刁… III. 编辑工作—文集 IV. 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2813 号

守拙集

责任编辑 张元立 朱向泓

封面设计 曹 艺

出 版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0531-86131712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0531-86131730)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作者自序

编辑这本自选集,旧作重读,回望蹉跎岁月,依稀可以辨认出我和杂志社、出版社共度风雨的脚印。

《伊犁的优势》、《积极深入生活,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是笔会总结文章,《且说横切与直缀——谈中短篇小说谋篇布局基本方式》是笔会讲稿。20世纪90年代,担任《新疆文学》(后改名《中国西部文学》、《西部》)副主编,时常应邀赴自治区各地笔会。无形中有分工,我主讲小说。记得还有一篇,谈小说语言、语感,遗憾的是那期杂志找不到了。两篇讲稿,轮番使用,前前后后讲过二三十次。这些笔会让我走遍天山南北,结识了几乎全新疆文学界的各民族作者。那时候,文学热,纯文学杂志在新的社会格局中即将被边缘化的命运还没有充分显现,笔会气氛的热烈欢快令人难忘。离开新疆转眼十年,有一次,在我似睡非睡的浅梦里恍然嗅到一股沙枣花特有的清香,醒来,蓦地想起来,是喀什笔会的那束花——和田作者穿越沙漠时顺手采来插在讲桌花瓶里的。我奇怪记忆里怎么会存有这样一个当时都没有留意的细节。潜意识里还在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90年代后期,纯文学杂志开始处境艰难,编辑们在迷茫中左冲右突。首先是抓编辑质量,重点作品配发评论,加大吆喝。《透过〈入党〉看罗雨》等一组长短不一的文学评论便是这个努力的岁月留痕。选了有代表性的几篇。《重要的是揭示了“徐达由现象”》则是抓住一篇有争议的作品积极组织评论连续三期争鸣,又组织新疆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后、代表杂志撰写的总结文章。其次是抓作品质量。《说不尽大漠神奇》是组织作家到油田采风时写的一篇散文。我之所以选点在沙漠运输公司,是为了方便与撒在各钻井队的作家联系、提供服务。现实中的沙尘暴很恼人,吃饭时嘴里沙子嚼得咯吱咯吱响;但此刻,记忆里连沙尘暴也是温馨的。

最大的努力大概就是组织作家为企业大写报告文学了。短期效果还好,上级表扬,企业欢迎,杂志刊登后新疆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杂志还拉来了赞助,扩大了发行,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我因为是新疆日报记者出身,自然是主力,写了十多篇。《大漠胡杨》等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便是当时的心血。《关于“有效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当时对发行每况愈下的焦虑。“把问题提到有效无效的高

度可能言重了。譬如我们的某些纯文学杂志,即使印两三千册,只能赠寄各地同仁,或是只剩下各地图书馆订阅收藏,也还是有人在读。但是得承认,这个阅读圈子太小太小,相对我们的心血、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文学理想,它几乎就是一个零。”“这样的发行量,这样的传播效果,真是愧对作者。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再坚韧的生命之绳都可能松弛疲沓得提不起来,作者队伍哪里会越来越壮大成熟。惯性不是一个能持久的东西。”然而,种种努力也难以恢复昔日辉煌。《新疆文学》邮局订阅发行最高时曾达到七万,最低时则降到两三千。现在回头看,一则被边缘化是大势所趋,二则这所谓的种种努力都不过是在旧体制旧机制的框框里打转转,注定的颓势哪里是编辑们的主观努力所能挽回的。

1999年我带着一部就差几万字就完成的长篇小说回到家乡。然而,十年里,我竟再没有闲情逸致把它写完。就是附在这个集子后面的《我亲爱的特卡斯河》,只在杂志上刊登了前三章。出版管理对我虽不算改行,但初来乍到,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总编室、办公室两办合一,琐事充塞,难有余暇他顾。即使写,也是“选题分析报告”、“年度图书出版分析总结”之类的公文。不知不觉几年过去。这些年,相对其他领域,出版界的改革步伐比较慢,尤其是带有综合性质的地方出版社。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注定了地方出版社全体出版人在一路泥泞中前行的种种艰难辛劳。感谢时代进步,社会成熟,新闻出版界的实质性改革终于在2009年大刀阔斧全面展开,它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高度,可以让我们怀一种如释重负的心境登高远眺即将到来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出版人在这种大发展大繁荣中新的靓丽的人生风景。在《展开双翼,更高腾飞——关于城市出版社应当重视地方性选题的思考》这篇论文中,我从地方性选题的角度涉及了社会出版需求问题。期待日益增长的社会出版需求在政策引导下充分转化,能真正成为地方出版社腾飞的动力。《〈努尔哈赤编年体传记〉编后琐记》其实曲折反映了我对编辑这个职业的依恋,毕竟在这个岗位工作了34年。虽然已到人生之秋,但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正如春花烂漫,年轻同仁的人生风景一定会比我们更加丰富多彩,因为编辑的命运与出版社的命运紧密相连;而出版社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

2009.5.18

目 录

作者自序	1
------------	---

论文·文学评论辑

展开双翼 更高腾飞

——关于城市出版社应当重视地方性选题的思考	1
《努尔哈赤编年体传记》编后琐记	6
必要的知识准备——当责编的第一步	
——《大连老房子》编辑心得	14
沉在史料里的爱情绝唱	19
且说横切与直缀	
——谈中短篇小说谋篇布局基本方式	26
伊犁的优势	32
透过《入党》看罗雨	35
重要的是揭示了“徐达由现象”	38
读《神杆》	41
读《英雄一去兮》	43
短小活泼 富于情趣	44
遥想当年刘宾客	45

关于“有效文化”	47
积极深入生活,描写社会主义新人	49
《青杏儿》序	52
《岁月如歌》后记	54

散文·报告文学辑

走天山	57
说不尽大漠神奇	61
狱中见闻录	71
大漠胡杨	84
血汗结晶“四连冠”	95
春回苏兴滩	110
岁月如歌(节选)	118

短篇·中篇·长篇小说辑

大理石雕像(短篇小说)	128
马儿驮着坎达拉(中篇小说)	135
我亲爱的特卡斯河(长篇小说节选)	178

展开双翼 更高腾飞

——关于城市出版社应当重视地方性选题的思考

一、顾此失彼的情况实在不是个别 重新审视经营格局很有必要

所谓双翼,即地方性选题与全国性选题。这是城市出版社及类似带有综合性质的地方社在经营范围上的特有优势。

计划经济时代,执行“地方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出版方针,地方社(那时候大多数城市出版社还没有诞生)只有地方性选题这一块用武之地;改革开放,以“长沙会议”为标志,这个方针改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充分利用对全国市场的准入,城市社和所有地方社一道,从自办发行,积极建立全国性发行网络,到加强策划,在全国性选题的作者资源占有上奋力竞争,按全国阅读热点组织生产自己的产品,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新方针兼顾“本省”“全国”两头,适应城市社的定位特点,指明了我们的经营方向,瞩目深远。完整把握,合理布局,两手抓,两手都很硬,路子就顺。反之,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以致经营格局失衡,则可能在全国市场打拼失利时两头皆空,进退失据。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厚哪一方都有可能;近年来的实际发生,应该还是厚全国薄本地。对“精品化、系列化、特色化”的热烈追求使我们无暇他顾。而恰恰在这几年,随着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地方的社会出版需求明显进入快速增长期,此消彼长,凸显了问题。当前,业界正在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央要求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重在解决问题,促进发展;重新审视经营格局,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具体贯彻落实。

二、地方的社会出版需求在快速增长 地方性选题具有巨大经营潜力

地方社会出版需求的快速增长在自然来稿这个口子表现最为明显。以党政机

关用书的时政类选题为例。重点恒定在党代会、人代会思路、目标、规划的宣讲解说,重大施政举措、成果及重大社会活动的总结展示。这一类需求过去主要由报刊、电视、电台等“短平快”传播媒体承担,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思维定式有变化。随着出版技术日新月异,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的保留长久、使用方便、装帧精美、信息量大、信息结构完整、出版迅捷、时效性同样也很强的优势日见彰显,党政机关频频叩响出版社大门。彩印设备的升级、技术的提高和价格的回落,使对画册类的出版需求尤显突出。计划经济时代,即使是相当一级党政机关也少有这笔开支和意识;现在,体制环境的变化使街道社区也有这个经济条件和实际工作需求。城市出版社所在城市一般都是省会、副省级城市,兼及辐射周边村镇县市,社会发达程度高,单位层级多,仅时政类的出版需求之大就可以想见;时政类虽是党政机关用书的重点,但从数量上看,还远远不是主项。政府摊大面广,涉及工商财贸文教卫生公安政法农牧副渔城市管理各个方面,他们的出版需求更大。企业的出版需求目前仅次于党政机关。节庆类、招商类、成果展示类出版需求数量很大。老厂老店名校的重大庆典、大型工程项目的竣工、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新生等等都有传播喜讯、记录辉煌、收藏经典时刻的实际需要。国有大型企业出书久已有之,如今,国有、民营、合资、大型、中型、小型,地位权力平等,叩门者队伍猛扩。过去,很多出版需求可以通过内部印刷品的管理渠道来解决,但现在由于商业需要、社会心理变化、企业对自身形象的重视、费用所差无几等诸多现实因素,企业对正式出版早已是情有独钟。事实上,现在许多出版需求确非内部印刷所能满足,譬如著名商业街改造竣工进入招商阶段,政府商家联手,图说此街历史、现状、前景,面对省内外可能的来巢之风;这样的招商类选题显然正式出版要比内部印刷更具实际效用。出版社也理当积极提供出版支持。出版追求的更加务实使企业出书甚至和商机直接挂勾。夏日海滩上有数以千计来自远东的俄罗斯日光浴者,旅游企业捕捉到这个商机,专为此特定人群设计了俄文本市交通旅游购物图、纪念风光明信片、画册及有关日光浴、洗海澡、吃海鲜知识的消费性出版物。这个新走向显示企业出书渐入深层次,预示了地方性选题巨大的经营潜力。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两个大户,个人散户的传统出版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譬如老教授身患癌症,弟子们收集老人平生著述,集资出文集作为八十寿辰的意外贺礼;富裕了的村庄重金聘学者撰修家谱,自己发行天下同宗。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不仅展现了地方性选题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促进了我们对出版作为产业正在缓缓回归本原的深入思考。这些年,我们对社会阅读需求研究得很多,几乎是日常功课,但是对社会出版需求的研究忽视得太久。

政治昌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各方面的深刻变化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出版需求的日趋旺盛。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认识。在出版业的管理

上,世界上不少国家采取的是登记制,出版单位数量巨大,但仅出几本书便销声匿迹者比例同样惊人;我国实行的是审批与登记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即出版单位是审批制,发行、印刷单位是登记制。这是符合我们国情的管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社会出版需求必然汇聚出版社的长久趋势。我们重视经营地方性选题,不仅出自实施产业化运作的内在驱动,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和自觉实践。

三、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什么办法好, 需求者和出版者都欢迎,就用什么办法

地方性选题范围很广,其中有一部分经过精心培育可以推到全国市场(这一部分以个人著述居多),这一部分历来都是受重视的。但事实上,这一部分现在并不是地方性选题的主体。它的主体如前所述主要由单位用书构成,最活跃,最具成长性,与当地中心工作、经济建设大局之关系也最直接。同时,因为它诉求的是实际需要,凸显的是地方针对性,明白无误的地域局限又使它一般很难推到全国市场。

需要我们积极面对的正是这一部分。

它有它特有的经营难点,譬如单本印数低、再版重印率不高,而出版需求单位多,来稿数量大。城市出版社过去的书号配置大部分偏低;除重庆、青岛,一般的城市社一年也就一百一二十个书号,这样的条件限定,无论是在全国市场打拼得卓有成效者,还是已拼得人困马乏者,都腾挪不出足够的书号来应对本地。前者有困难——要想在全国市场闯出品牌特色,需要保持一定数量书号的持续投入;相对这个追求目标,书号已经捉襟见肘,哪有余力对鸡肋感兴趣。后者有顾虑——从经营角度掂量,遍地鸡肋确是可以转化,有足够书号,集腋成裘;否则,于事无补,甚至可能两败俱伤。于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实际状况是,相当级别党政机关的重要选题,出版社勉为其难;一般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即使自费、包销,也只能挑肥拣瘦。多数不能实现其出版愿望,新的“出书难”现象逐渐浮现,一些机关单位甚至有了对立社宗旨的直接叩问。当地一时排不上队,远走他乡寻求出版,资源流失,“出版掮客”也应运而生。

现在书号问题缓解了,从容应对有了前提,但根据差异性,实事求是地采取多种经营方式,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这类印数低、再版重印可能性不大的地方性选题,采取全国性选题的经营方式显然行不通。互利共赢,符合双方实际,真正有利于这部分出版资源的顺利解放。虽然同是一个社的产品,甚至是地方性选题,但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生态条件、不同的市场特质,因而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不同的

经营方式,这个思路符合实际,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实上实践之河也是这样流动的。登记制国家每年大量的进入退出者中,很大部分便是需求和出版的身份重叠者。对于他们,成本自担,不言自明。在我们国家,这类用书的出版需求者虽然身份单一,但并不意味着该承担的便可完全转移到出版者一方。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什么办法好,需求者和出版者都欢迎,都能接受,就用什么办法。不适应实际、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只有勇于实践、积极探索,我们才能在开拓创新中走出中国特色出版发展的新路。

充分开发地方出版资源,一定要摆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对那些关乎中心工作、关乎经济建设大局的选题,即使经济效益不明显,我们也要主动热情提供服务。被动应付的精神状态、主要着眼于经济效益的“挑肥拣瘦”作法应该改变;起印数、包销数、包销折扣指标定得高、定得死,削足适履式的硬性尺度应根据两个效益统一、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适当调整。同时,也要坚决防止随意扩大包销、强迫包销的另一种倾向。需求者该承担的不能完全转移到出版者一方,出版者该承担的也不能随意转移到需求者一方。另一方面,对个别社会效益有负面影响的选题,即使有再好的经济效益,我们也要坚决杜绝,严格把关,时刻不能淡薄责任意识。要清醒地看到,我们既是在满足需求,也是在创造需求,引领需求,摆正两个效益的关系,事关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发展方向,事关城市社的发展前途。

四、加强队伍建设,时不我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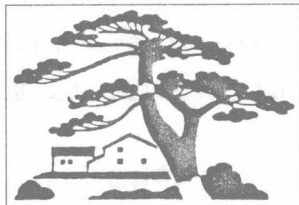
地方性选题与全国性选题齐头并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有一个与经营格局相适应的生产架构。

有足够的编辑力量,才能有效坚持优选职责,切实提供专业的编辑加工服务,确保图书质量、装帧设计质量。地方性选题虽然在发行范围上与全国性选题有差异,但对其质量要求不能放松。放松对长久发展有害无益。有细致的内部出版管理,才能有效降低成本,减轻各自负担,确保印制装订质量。更重要的是,严格掌握出版环节,才能确保所有图书生产方式一样,按正常操作流程,严格三审三校三改,编印发三个环节全在出版社“体内循环”。包销并没有完全占满这类图书的发行空间,改变这类图书的发行原生态,正是鸡肋转化的关键。总之,资源流失的情况不能再继续。这种流失也是“买卖书号”“文化垃圾”之源。我们重视地方性选题事实上也具有源头治理的现实意义。

2009年,出版改革逐步深化,政策支持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异地建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解放和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

地方性选题这一块无论是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将不再是我们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地不会荒芜,你不种有人种。绿化祖国,人人有份。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近水楼台,我们理应及早耕耘,精耕细作,不辜负大好春光。从理论上讲,地方性选题和全国性选题对应的正是社会出版需求和社会阅读需求。这两个需求对于出版产业,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展开双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才能更高腾飞。

原载《中国出版》2009.5



《努尔哈赤编年体传记》编后琐记

任何一本书,编辑的过程都是学习的过程。对新编辑是这样,对老编辑也是如此。哪有什么都懂的编辑,不过是勤于学习而已。只要用心,收获的就不仅仅是摆在你书架上留作纪念的一本书。

因此,整理这些琐碎的重点在有关知识的积累。也许将来再编同类书时用得着。

一、关于传

选题论证阶段,一些同志出于市场营销考虑,希望能换个更吸引眼球的书名,譬如《努尔哈赤大传》。七十万字,上下卷,本来就是大型传记么。还有人嫌编年体三个字学术味太浓,建议去掉。究竟什么是传?用大传合不合适?编年体有什么特点?为此,编辑过程中翻阅了几本书:《史通》、《文史通义》、《清代史科学》、《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辞海》。

传之小传 最早的传,见于《春秋》,如《左氏传》、《公羊传》。但那时候的传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人物传记,它是用来释经的文体。经者,儒家经典;释经,即以事例解释宣讲儒家经典,因此它是经传。俗话说,名不见经传,这“经传”的由来就在这里。当时,还有纪传,记录某一类事情,如正史的《四夷传》、《外国传》,重点在事不在人,依然有别今天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唐人刘知几的《史通·列传》说得很明白:“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史、汉,《史记》、《汉书》,把《史记》、《汉书》里的列传视为释纪之用,说明到汉唐,传还是以人属事,或从属经,或从属纪。到明清,传与纪(记)才开始有明确分野。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内篇·传记》说,“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传记合为一词,是现代的事,通常的理解中它已经是一个同素词。明白传、记大致的演变过程,可以避免对古籍的误判,如带传字的,不一定就是人物传记;包括列传。今人理解的人物传记是关于人物生平的文字,是以人为

主的。今古差异还是明显的。

传的类别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传又可细分为很多类项,下面是常见的:**列传** 官修纪传体史书必有的栏目,对象多是王侯重臣,对传主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但简单扼要;以纪事为主,基本上反映人物一生概貌。**传** 发展到明清,“录人物者”的传体例与列传大体相同,但重要区别有二:一是私人撰写而非朝廷官修,二是传主是正史所漏载者。**附传** 正史中一种比较简单的传记,作为重要补缀,附在一个重要人物列传的后面。**合传** 也载于正史,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个人物各自立传,合为一卷;另一种是一篇多人,或夫妻或父子或一门合传。**别传** 对本传的补充。**家传** 家谱宗谱里的传记文。

有些传类,内容单纯,可以顾名思义,如自传、评传、全传、前传、后传;有些则不能想当然,望文生义可能会出错,如小传、大传。小传,小型的传记,简略记叙人物生平,这个可以顾名思义,但大传可没有一般所理解的伟大、宏大、大型之意,它有固定的意思和文史渊源,和小传没有相对关系。大传一词最早见《礼记》,为第16篇的篇名——《礼记·大传》。这篇文章通引《仪礼·丧服传》中的条文以推而广之,弘扬“祖宗人亲之大义”;这以后,这类传都叫大传。唐人孔颖达对其的解释是:“名大传者,以其记祖宗人亲之大义。”此后大传一直凝固在“记祖宗人亲之大义”这个专有意义上。现在,确实有很多大传,如《袁世凯大传》、《蒋经国大传》等等,都取的是宏大、大型之意。已有文史专家指出这是误用,不能效仿。

真正具有相对关系的是前传、后传,内传、外传。内传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经传。《国语》,古代经学家认为其为《左氏传》的外传,因为它并非专主解释经义,而是广引事语,推演本文,所以是《左传》的外传,有共依共存的相对关系。发展到后来,外传还有常见的情况,即记叙正史不载的传主的轶闻逸事。

文学作品的传 有的是直接沿用、袭用史学,有的则是不拘一格延伸创新,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虽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学和史学毕竟还是两码事。如果我们编的是史学类图书,还是用史学标准。反过来,也不能用史学标准轻率评判文学中传的使用。如《阿Q正传》,强调正传,自有深刻瞩目,并非误用。古籍中确有正传,如《书法正传》,这种正传的传,读 chuán,鲁迅先生当然知道,因而他说“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正传在这里不是史学的引用,而是文学的妙用。

编年体的长短处 编年体是史书体裁分类中的大类。最典型的作品是皇帝在世时的《起居注》和死后由新皇帝为前朝编纂的《实录》,分年按月逐日记叙大事小情,代代相因,续修不辍。它的特点是顺序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明确,便

利读者查索;依凡例确定的内容,逐一撰写,始末明白,结构较为规范严谨;叙事按发生发展变化的时间进程,层次分明,比较完整。此外,还有史料繁富的特点。这个特点,对研究者是长处,但对一般读者,就是短处了。《努》的作者皓首穷经,积一生之丰富考证,立说七十万言,尽扬编年体之长,又力避其短,取舍精当,详略有致,轻弃编年体三字,既负作者苦心又反失光彩。

二、关于注

《努》的知识含量大,保有一定学术水准,引文就多。来稿时,作者不知你一旦采用将设计什么开本,担心窜页窜行后脚注混乱,他只能采用文内注的方式,注随文走。而成书须改为页末注,几百个注,工作量很大;此外,注也有种种情况,也需深入学习、细致研究。

引文注释的种类 《努》这种大众史学类出版物的注常见有三种:页末注(也叫脚注)、文末注(又分段落和篇章注)、文内注。

文内注 排在正文中,例如,“‘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遂尽杀之。’《清史稿·明安传》卷229”,作者来稿都是这样的文内注。成书偶尔也有采用文内注的,前提是全书只有很少几个注。注要加圆括号,排在引文后,字要小一号。

页末注(脚注) 排在本页最下边,与正文之间放一条界线,叫注线;一般从顶头排,长度占版面宽度四分之一左右。脚注的字要比正文小一号。正文内注码排在文字右上面,通常采用①②③……标符。每一脚注全文应与正文中的注码在同一页,每一页均从①号排起。本页只有一两个注,可用星标,即※,但要注意全书统一,若前面是①②,还是用①②。

文末注·段落注 不常见,是随正文在段落后面排的。一般使用“注”字或“注1”“注2”等。字体与正文有别。

文末注·篇章注 史学专著常见。排在篇章后。也有集中放在全书末尾的。其情形类同学术著作的参考文献和主要参考文献。

引文注释的著录规则 目前,据我所知,还没有适合各类型出版物引文注释著录规则的国家标准。倒是有适合各类出版物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最新的是国家标准 GB/T7714-2005。按说,文后参考文献也是文末注的一种,两者有共同之处,可以参照。但古籍没有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官修正史还说不清作者,一般也没有页码,很多著录内容实难和现代图书对上号,参照 GB/T7714-2005,很多都是空项,全书难保持统一原则。翻阅了近年中华书局等大社的出版物,决定还是跟他们走。

引用古籍,官修正史,没有作者名的,只注书名、篇名,篇名写在书名号内,其间加“·”。有卷册数的注明卷册数,卷前数后。例:《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古籍个人著述有作者名,则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古籍很多没有页码,页码项统一省略。当代个人著述,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等项内容都有,若都录,同在一页,古简今繁,不合谐,也采用中华书局办法,如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第341页。以今页代古卷册,保持了全书统一。

也遇到了一些颇费踌躇的问题。如,“天命十五年(1620年)妃获罪死。”^③“洪太主虽英勇过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④注释号都在引文句号和引号外。这是《努》成书的排列次序。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的类似情况排列次序并不统一,甚至同是一社,也是次序各异。有上面那种次序的,多见;也有下面这种,少见,例:“天命十五年(1620年)妃获罪死^③”。“洪太主虽英勇过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④”。前一种是传统,后一种,一查,原来也有根据,是参照了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法与参考文献表示例》。其例如下:……美国学者布萨认为,“可能早在七八世纪就已经有了圣经语句的索引”^[25]。英国人惠蒂认为,附有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的手稿,至早在十四世纪才出现^[26]。目前,符合公认标准的最古老的索引是1247年英国雨果编的《圣经重要语词索引》^[27]。这段范例中,脚注号与句号的次序是脚前序后,特别要注意完整引用句,竟也是脚前句后,这和传统次序大不相同。显然,前面提到的后一种用法是在向新规则靠拢。思量再三,考虑到新规则还停留在学术著作范畴(它采用方括号就是标志,学术著作的引文括号一般是方括号),还是随中华书局,用老次序。

这里要说明,目前,业界学术性著作包括财经、政教、社科等类出版物的文后参考文献已经完全采用GB/T7714-2005著录规则了。特别要指出,包括注释、脚注;尤其是学术论文、专著。这是方向,历史类图书先天缺项太多,可能步子慢点。新老规则差异很大,例如新规则专著的著录格式,1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页;连续出版物(杂志)中析出的文献的著录格式,2李四光.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中国科学,1974(4):400-429。按老观念很容易出错。

很多古籍原本没有标点符号,因而引文中引号与句号次序混乱的情况很常见。掌握的原则是根据原文判断是全句完整引用还是截取。若是完整引用,一般在上引号前加冒号,即:“×××;引文最后加句号,再加下引号,即×××。”反之,则句号在外,即“×××”。

有些注,内容杂,需要重新整理。原引文就有注,再加注,叫附注。如《努》下卷210页,“原注:札勒、色楞皆察哈尔图门汗之孙。其国内争汗位而乱,入科尔沁。本

书作者附注:按辈分,此二人乃察哈尔林丹汗之叔、伯,见《满文老档·太祖》册65。”原注附注连排,以方便读者为要。

三、关于数字、年号

数字用法也有最新国家标准,适用项中有“普及性读物”一项,但不适用项中有“文学书刊和重排古籍”两项。《努》介乎两者之间。

新规则大的原则有三:一是阿拉伯数字笔画简单、结构科学、形象清晰、组数简短,应该广泛应用;二是目前体例尚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三是遇特殊情况,或者为避免歧解,可灵活变通,但全篇体例应相对统一。

一般原则不具灵活性,必须遵守规范。如统计表中的数值,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示例:48、30%、 $1/4$ 、1:500。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等,必须使用汉字,示例:三叶虫、星期五、三氧化二铁、九三学社、十一届三中全会。物理量量值必须用阿拉伯数字,示例:45克、34℃。非物理量一般情况下也应使用阿拉伯数字,示例:30万元、48岁、46万册。如果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字中,则可以用汉字,但要照顾到上下文,求得局部体例上的一致,示例:三本书、读了十遍、五个百分点。相邻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必须使用汉字,而且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能用顿号隔开,示例:二、三米、一两个小时、十三四吨、四十五六岁、一千七八百元。带有“几”字的数字表示约数,必须使用汉字,示例:几千年、十几天、一百几十次。用“多”“余”“左右”“上下”表示的约数一般也用汉字,示例:十余次、三千左右会员、二百多人。

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秒,要求使用阿拉伯数字;干支纪年、历史纪年必须用汉字。

《努》原稿数字体例不统一。参考各社历史类图书也是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和以汉字为主两种(这里说的“为主”不包括只有惟一选择的一般原则,一般原则已不是推荐性标准)。选哪种都各有优劣。经过斟酌,我选了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多数地方还顺眼,但个别地方也感觉别扭。如“先生在1962年出版的《清代前史》中曾明确指出古勒山大战实际斩获3673人;是根据《明史·李成梁传》卷4‘古勒山之战斩三千六百七十三、缴马匹六千八百四十二、被掳民妇九百四十三、粮草……’”古籍引文数字都是汉字,现代著作引文数字又是阿拉伯字,二者碰到一起,对全书体例统一的原则又是诘难。校对的同志主张一律改为以汉字为主。同样也有局部的别扭问题。比如世纪、公历年代用阿拉伯数字已是惟一选择的原则,那么就会出现:“18世纪就